

海峽兩岸三地教會互動的神學反省

林瑞琪¹

本文以梵二的教會觀為基礎，反省 1980 年代大陸宗教政策開放之後，天主教會的重建過程。一方面，點出台、澳、港教會梵二之後的發展，仍不脫複印 1949 年以前的大陸教會，亦即仍與十九世紀的歐洲教會模式相同；另一方面，也指出當今大陸教會受台、澳、港教會的影響，也走上了同一模式。這模式就是「農村教會」的模式。為了走上梵二所希望的教會模式，兩岸三地的教會當局，的確該好好思考本文所提出的現象。

中國大陸天主教會自 1970 年代末期開始，逐步從沉寂復甦。為大陸教會的成員來說，教會的復甦就是「重建」，而非開拓新天地。中國天主教會在過往近二十年的重建，經歷了多重蛻變，所得的多，然而失去的也不少。總體而言，教會體制是逐步恢復了，但整體教會卻在茫茫大海中失卻方向。

本文以下為筆者對大陸天主教會所處境況的反省。筆者嘗試跳離個別人士的成敗得失、合法非法的問題，以至體制上的法度及理性，而從歷史全盤發展的角度去探討中國天主教會的未來。筆者所探的是絕對悲觀的立論，希望能為教會內眾弟兄姊妹提供一個新的視野，在探討問題時有多一種考慮。

¹ 本文作者：林瑞琪先生，平信徒，香港教區聖神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、兼執行秘書，著有專論《誰主沉浮：中國天主教當代歷史反省》及《半世紀徘徊：中共宗教政策與實施探討》兩書，另著有雜文集《二人修院》。

當前大陸教會的重建是三重複印

近二十年來大陸教會的重建過程，可以說是一次三重的複印，這三重複印在不自覺之間默默地進行，但對教會的未來卻影響深遠。

第一重複印：從歐洲到中國

第一重複印，是在 1840 年以後，因著列強與中國簽署一連串的不平等條約，外籍傳教士大量迅速地湧入。他們急於求成，未有機會探視中國社會現實，而急切地將西方教會的模式複印到中國大陸上。這次複印歷時長達一個世紀，其中經過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中國天主教會本地化運動。然而本地化運動的結果只是在人事上由外籍教士改爲國籍神職人員，並沒有觸及大陸教會的深層結構。結果是在中國大陸上建立了一個以中國人爲主，但面貌及精神均取法歐洲的中國天主教會。

第二重複印：從大陸到台、澳、港

中國共產黨在大陸上當政之後，天主教會的發展遇到嚴重的挫傷。大量傳教士及不少國籍神職人員離開中國大陸。五十年代開始，這些來自大陸的神職人員，在眼見一時無法返回中土的時候，將他們的希望都放在台灣及香港天主教會身上，且在不知不覺間，將整個 1949 年之前中國大陸天主教會的模式，複印到台、澳、港各地上。這是第二重的複印。

第三重的複印：從台、澳、港返回大陸

隨著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大三中全會所推行的「開放政策」，中國大陸上的天主教會得到逐步的恢復。教會恢復的初期，主要是靠自力更生，在困苦中重新屹起。到了八十年代中

期，大陸教會與台、澳、港及海外的教會接觸增加了²，大陸教會的成員對台、澳、港教會的發展「殷羨不已」。多番交流的結果，台、澳、港教會對大陸教會的影響漸漸深入至教會各階層，大陸上不少神長教友亦期望以台、澳、港教會為模仿目標，竭力建立一個與台、澳、港教會相仿的「地方教會」，結果形成了第三重的複印。

每一次的複印，都不單只是將原有的教會模式及形象重覆一次，而是帶著教會在歷史中的沉澱物一起複印。結果是歷來教會所有問題，均不斷地在新的複印中出現。

三重的複印是同一回事

在我們看到中國大陸教會正在進行第三重複印時，我們必不可以忘記，這次複印在過程中是複印自己，但也是複印最原始的模式——十九世紀中期的歐洲教會。

這三重複印使得大陸教會在重建過程中，有深得我心之感，因為這正是其安全感之所繫；不斷地複印教會的模式，為大陸教會帶來「廉價的指標」，大陸教會可以因此而輕易地重拾自己的身分。然而，這次的三重複印，為教會也帶來不輕的代價。

接上所說，三重複印之後，中國大陸教會的最原始基礎，乃是一個十九世紀中期的歐洲教會。我們試分析十九世紀歐洲天主教會的特色，可以從許多方面探討，但整體而言，教會卻同時面對資本主義流行及共產主義興起的兩面夾擊。歐洲天主教會的反應是：閉門不問世事。這一點最具體的說明，表現於梵一大公會議之上。在歐洲思潮迭起之際，梵一的結論竟是「教

² 1985年上海教區金魯賢主教首次率團訪問香港，揭開內陸與香港兩地教會大規模交流的序幕。參閱《鼎》28期，1985年8月，46~49頁。

宗有不能舛錯的神恩」。這端信理容或有牧民上的意義，但梵一這種取向，正說明了其「對外封閉」的心態。教會這種封閉心態，直至 1891 年《新事物》通諭出版之後才有所改變，然而，《新事物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及經濟大蕭條之前，一直未受到教會內外的正視³。這種不問世事的教會觀，直接地複印到 1949 年的中國教會身上。

三重複印當中，既曾經複印了中國大陸教會自身，教會於是不自覺地回到 1949 年之前中國教會的模式上去。1949 年之前的中國天主教會，最主要的形象是一個「農村教會」，這個「農村教會」的形象，曾經活現在五十年代以後的香港天主教會身上。（在臺灣的情況我了解不多，不感妄加判斷。）

「農村教會」模式

筆者在 1996 年及 1997 上半年，多次與在香港教會內的弟兄姊妹分享「九七後香港基督徒處境」。筆者多次提到香港教區的心態定位，是「現代化的農村組織」，意指香港教會享用了一切現代科技成果，但骨子裡卻完全是一個「農村教會」的心態。農村教會模式絕對不是指地域而言，而是指香港教會的次層文化及思想心態⁴。

「農村教會」有三項特色：「自我滿足」、「時令安排」、「人際關係」。

自我滿足

農村組織傾向於自我滿足，即將所有面對的問題，放在農

³ 1891 年《新事物》通諭出版後，教會內的反應並不熱烈，教會外更是不堪提，因此在其後三十多年寂寂無聞，到 1931 年教宗庇護十一世才發表《四十年》通諭，做出教會本身最高層次的回應。

⁴ 在筆者記憶中，曾有多位神學家曾提出過：城市中的堂區仍保留農村心態，因而不足以解決現代問題。由於行文匆促，未及整理出處。

村內去解決。每一個農村，都包羅了村內所有成員「生、老、病、死」一切需要，不假外求。農村心態假設本身有足夠的智慧去解決一切問題⁵。

教會的農村心態必須假設教會本身有一切解決問題所需的人才，因而對外界的專業技術敬而遠之。結果，教會內許多神職人員，奉派去處理世俗專業事務；人力資源固然浪費，而且「只紅不專」往往造成水準失誤。

時令安排

農村組織的另一特色是以「時令安排」代替「策劃目標」。農村組織沒有計劃目標。（也許中國建制試驗中的「人民公社」是唯一例外，但「人民公社」到頭來卻是一場慘敗。）為農村組織而言，決定生活節奏的，並非策劃指標，而是既定的時令安排。

放眼香港教會，由上至下都拿不出一套完整的發展方案，但整體的心血卻不斷消耗在一年一度、時間表上不得不行的既有活動之上。教區於 1989 年頒佈的《邁向光輝的十年》牧函正好是這方面的寫照。牧函發表後具體落實的措施並不多，倒是將大量物力放在中期檢討之上，結果使牧函成了時令上「供奉」的對象，而不是落實具體執行的動力⁶。

人際關係

農村組織並不重視專業技術，而重視個體能否為整體所接受。因此，人際關係成了整體內在互動時首要的考慮因素。因

⁵ 詳閱：金耀基著，《從傳統到現在》（台北：時報文化，1978年，增訂二版），第一篇〈中國的傳統社會〉之「三、經濟制度」及「四、價值系統」，48-52頁。

⁶ 八年之後，回首當日，筆者大膽說一句，無論當年有否牧函，香港教會今日的面貌差不多完全一樣。

此，權力及責任體制有時反成了人際關係的從屬品。

香港天主教會的人際關係因素並不明顯，但在潛藏中不斷發揮作用。這一點可能在許多民間機構均存在。然而，現代化的組織，本身並不容許人際關係對組織體制的干預，香港天主教會顯然未能做到這一點。

重蹈台、澳、港教會的困境

一個不問世事的天主教會，將極可能重蹈台、澳、港教會在七十年代的困境，即在社會面對經濟起飛的一刻，因著社會問題的轉型，許多原有賴教會解決的社會問題漸次消失，教會的社會的功能也因而減弱；然而，社會上新近冒起的問題，卻遠非教會有所準備的事項，結果導致天主教會進一步封閉，以致失卻在社會群眾中的認受性，成為自身所處社會的陌路人。

大陸教會經歷三重的複印，而面對中國大陸經濟不斷改善的現刻，台、澳、港教會的教訓，是不可掉以輕心的。

三重複印之後，教會找到其急切需要的安全感，然而卻失掉原有的方向感。大陸教會既然進行了這三重複印，即不斷聚積了歷史的沉澱物，令到其自身進行改變的機會相對減少。在第三次複印的過程中，我們更可以看到中國大陸教會不幸地錯失了一次珍貴的經驗：即以生命血汗換來的梵二經驗。

大陸教會原本已經闖出新路

筆者特別提出這三重複印模式來與讀者討論，是因為這種複印在歷史上絕非必然的。筆者相信天主聖神曾經給予足夠的啓迪，讓大陸教會另闢坦途。起碼，在大陸教會剛剛復甦的初期，曾有極佳的機會作出突破。這項突破性的更新，在於以現實生命回應普世教會在梵二改革中的呼聲。

八十年代中國教會的復甦，再一次確證了聖神不斷地帶引

著教會每一個成員；引領中國教會從現實生活中，分享梵二革新的一些經驗，為日後接納梵二的革新立下基礎。

筆者曾於 1992 年撰文論述中國大陸教會的梵二經驗，該文首先以中文本及英文本於《鼎》雙月刊 1993 年 4 月號發表，隨即在 1993 年 6 月愛爾蘭耶穌會的神學月刊 *The Month* 之上轉載。本文以下節錄該文的要點，為讀者提供一個討論的基礎。

梵二的重要特色之一，在於並不頒佈任何新的信理，而是教會「首次自我實現其作為世界教會的角色」⁷。換句話說，梵二會議所帶出的特色，就是將天父藉基督身上對教會的完整啓示，以現代人的語言表達出來，向二十世紀的現代世界作出回應。

說到梵二思想對現代社會的回應，筆者大膽將之歸納為三大部分，即「本地化的教會」、「教友的參與」及「與各宗教及與無神論者之間的交談」。

本地化的教會

1979 年中國教會開始按步就班地復甦後，大部分教會人士都沿用梵二會議之前所施之於全球的拉丁文禮儀。無疑，禮儀所用的語言是教會生活中最外在的標記之一，但我們卻不可因此而忽略了教會生活的另一項重要標記——信眾的團體。

中國教會經歷了一次痛苦的洗煉，使她較諸亞洲任何地區，更早成爲一個純正的本地化教會。五十年代中期，外籍傳教士及外籍教友悉數被驅逐出中國，教會的傳教使命，完全落在本地神職人員及教友身上。無論這次分離是多麼的不幸，當

⁷ 耶穌會神學家拉內神父 [Karl Rahner] 著，"Towards a Fundamental Th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Vatican II"，該文第一稿刊於 *Theological Studies*, 40 (1979) 4, pp.716~727；本文中譯文，由胡國楨譯出，題名〈梵二基本神學思想的詮釋〉，刊在《神學論集》50 期（1981 冬），539~555 頁。

中牽涉多麼大的政治問題，但卻無可否認是徹底改變了中國教會。八十年代的中國教會之內，雖仍然存在有待解決的主教職合法性及與普世教會共融的問題，但整體而言，她確實是一個完整的本地化教會。

此外，本地化的教會這個概念，也涉及本地化的處境，這個「處境」，不但指地理上的境況，也指社會性的境況，意思就是，她必須是個與當時當地社會所關注的問題息息相關的教會。

無疑，在大部分中國的政治運動之中，教會都首當其衝，更令中國教會受到深深的損害。中國教會過往的經歷，也令她真正體驗到中國人的痛苦，承擔了中國歷史命運中最不幸的一頁。中國教會不能改變中國歷史，但卻能為中國人在困境中帶來希望，達致真正的承擔與同行。

教友參與的教會

教友的參與是梵二革新的另一重點。筆者稱中國教會體現了「教友的參與」，並非說中國教友取代了神職界成為教會的領袖。相反，他們較諸世上其他地區，對神職人員有更深刻的尊重。中國的教友勇於向主教及神父發言，敢於表達自己的意見，但又不堅執於自己的意見。他們敢於提出，也樂於服從。

筆者覺得梵二《教會憲章》第37節中用了「家庭式的關係」來形容平信徒與牧者之間的合作，實在最適切不過。而這正好是中國教會的寫照。

中國教友對教會的參與，亦體現在教堂的建設及信仰的延續方面。在北方許多聖堂，是由教友一磚一石從平地中興建出來的。他們流血流汗，自掏腰包購買建築材料，也利用一切工餘時間，將他們心目中理想的聖堂建設起來。

雖然過往四十多年間，中國許多地方的教會都缺乏牧者領

導，但整體教友人數仍不斷增長⁸。這實在是教友在家庭內傳福音以至在社會中做見證的成果。

不同宗教間的交談

顯然，在中國的天主教會內，暫時仍未設有類似宗教間交談「委員會」或「秘書處」的機構，在造訪國內的神長時，他們亦謙稱對宗教間交談所知不多。不過，也許連他們自己也不發覺，他們曾經承擔著最切實的交談使命。

在過往四十年間，中國的各個宗教都經歷了不少創痛。特別在「反右」及「文革」期間，宗教徒歷受迫害，他們往往被編配到同一所工廠或勞改場接受「再教育」。在這些勞改場內，他們不但有機會彼此認識，也藉此接觸到其他宗教人士具體生活的一面，且在這些困難的境況中，首次有機會了解到彼此的信仰如何支持自己在困境中奮鬥，他們的宗教信仰對痛苦及生命有甚麼意義，以及信仰怎樣為每一個宗教徒在絕望中帶來希望。

往日，國內的神父及修女，在學習時只側重辯論天主教與其他宗教的差異。天主教徒（事實上也包括所有宗教徒）都以自己的立場去論斷他人。但在勞改場內，每一個人都不再以自己為中心去看別人，而是細看眼前這個實況當中，神在每一個人身上究竟行了甚麼奇事。每一位不同宗教的人士，不再是「外人」，而是切實的同行者，是旅途上有血有肉的友伴。這分勞改場的生命經驗，亦是梵二所提出的人類生命核心問題：

對於今日一如往昔，那深深激動人心的人生之謎，人們由各宗教期求答覆：人是什麼？人生的意義與目的何在？什麼是罪？痛苦的由來與目的是什麼：如何能獲得真

⁸ 請參閱拙作〈中國天主教會教友總數問題分析〉一文，刊於《鼎》71期，1992年10月，40-46頁。

幸福？什麼是死亡，以及死後的審判和報應？最後，還有那圍繞著我們的存在、無可名言的最終奧秘：我們由何而來？往何處去⁹？

在勞改場中，不同宗教的人士，首次有機會共同面對無神論的考驗，有機會一同表達出自己的信仰在現代中國的意義。「無神論」為他們來說，不再是一個哲學上的問題，而是一個實實在在擺在眼前的挑戰。每天監管著他們生活上一舉一動的人，正是主張「無神論」者。

他們所面對的無神主義者，不少是懷著善意的人，相信只有無神論能解放人性，認為無神論是中國的希望。但這些無神論者卻在勞改場中見到宗教徒的受苦及忍耐，見到承擔，見到人性的昇華。他們有機會對宗教徒作出更深入的了解。宗教徒為他們來說，不再是宣傳刊物中受舊社會、舊思想束縛的文化奴隸，他們是人，更是願意活出人性美麗一面的信仰者。這種生活上的見證，成了宗教信仰與無神論者之間最切實的交談。

梵二經驗的失落

然而，經歷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的重建，三次複印的效果明顯蓋過了中國教會在逆境中所得的珍貴梵二經驗。

中國大陸教會致力複印台、澳、港教會。但在致力重建相似於台、澳、港教會外在架構的同時，卻忽略了教會最珍貴的精神本質。上述三方面的梵二新面貌，在三重複印之後可說是消失淨盡。

本地化教會的消失

當前的中國教會並沒有外籍傳教士任職（很特別的例子除外），但整體教會傾愈來愈脫離本地化。中國教會有機會派送

⁹ 梵二《教會對非基督宗教態度宣言》第1節。

青年人到海外深造，誠屬美事，然而，大批深造回流的青年神職界，卻無疑令到中國神職界清楚地劃分為兩大類，明顯地有「洋」神父（曾經飄洋過海的神父）與「土」神父（本土培育的神父）之分。「洋神父」處處受人重視，土神父不自覺地顯得自卑，也多少受到白眼。更甚者，土神父當中也不自覺地互相攀比。即使未曾出洋，但只要曾經到過上海佘山，也算沾多了幾分「洋」味，身分也重要得多。

「洋神父」的重新出現，令到教會前景起了重大的變化。「洋神父」的出洋，並不單爲了培育未來修院工作的接班人，更重要的是，許多教區的領導人都期許這些「放洋留學」的青年神職人員，能接手教區的領導職。

表面看來，多讀一點書，學歷高一點的，自然應當成爲領袖。然而，若我們從整個選才過程看，則明顯暴露大陸教會未來的接班危機。

假如將教區接班人的選才範圍主要局限在「洋神父」之內，而成爲「洋神父」的重要條件之一是外語流利，則我們會輕易看出，青年神職界當中的外語能力，成了選才的一大障礙。作爲牧者，最主要的要求是認識他的羊群。說到底，外語好壞究竟與牧者身分有何關係呢？

教友參與的消失

在八十年代結束之前，中國大陸上教會的弟兄姊妹十分熱衷於自力更新，量力而爲地建設自己的聖堂。由於建堂的工作令人感動，許多海外教會團體都熱心提出支持。這一下變成了幫倒忙。到了九十年代，教會全面變成一個「倚賴型」的教會，建堂時首先考慮的不是教友的需要，也不是教友的方便，而是如何滿全海外資助機構的申請條件。基於水漲船高的原理，聖堂造價不斷上昇，以至完全脫離中國內陸的現實。教友在教會

建設過程中的角色完全消失淨盡。

在這眾多的教區建設中，不少個案是爭取興建主教府。但隨著主教府的出現，主教與他的羊群卻無可避免地因人為而分隔開來。教會內的信眾，再次由參與者變成「被統治者」；教友參與的教會亦從此逐步消失。

宗教交談的中斷

前面所述宗教之間的心靈交流，似乎只有在困難的境況中才能實現。一旦處境有所改善，宗教間的競爭又重新出現。在廣東省汕頭市，基督教會興建了一座耗資四百餘萬的大型禮拜堂。當地的天主教人士，儘管並未發覺教會內的信眾有此需要，但仍傾盡全力四出募捐，徵集了一千萬人民幣興建比基督教堂更大、更輝煌的天主教堂。

建堂如是，教會神學院用地的攀比如是。天主教會全力維持一座虧本的印刷廠，說到底就是因為基督教有戰績彪炳的愛德印刷廠。

宗教人士與無神論者的交談，也隨著教會的複印而消失。天主教會重新成爲一個建制上的財主。在時間上教會這種轉變剛好碰上共產主義的理想衰退，無神論理想從中國共產黨身上消失。結果是掛著共產主義招牌而失卻共產主義理想的中國共產黨，拉著重新披上建制負累的大陸天主教會，一同在資本主義潮流下浮沉。

沒有痛苦的教會觀

對目前的大陸教會而言，梵二經驗的失落，不可以「痛苦」二字來形容。大陸教會的梵二經驗局部來自其痛苦的經驗，而九十年代大陸教會走的道路，正是竭盡全力擺脫痛苦。然而，在另一方面，全力建制建設並未爲大陸教會帶來太大的喜悅，

至少就個人的觀察而言，眼前的建樹帶來的喜悅，完全被隨物質富裕而來的紛爭所抵消。

因此，大陸教會的處境既非痛苦，也非喜悅，筆者只可以稱這是一個「麻木」的教會。這個教會不願對往日的經歷有任何回想，結果是痛苦成了白白的創傷。

大陸教會努力成爲一個沒有痛苦的教會，但這並不表示她的未來就沒有痛苦。不過，當她不敢正視痛苦時，將同時失卻正視生命真諦的勇氣。一個沒有痛苦觀的教會，是一個不幸的教會。

教會唯一的複印：初期教會與基督一同生活的團體

大陸教會這種不幸，來自其三重複印。這三重複印是在借來的時間無可奈何的產物，但卻絕非歷史上的必然。當大陸的教會有機會靜靜反省其命運時，她應如何看待自己在歷史中的路向？

一如上文所說，三重複印不是歷史的必然。教會在選擇自身的道路時，難道不應直接回到普世教會的根基——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身上嗎？基督是我們唯一的複印的楷模。與基督一同生活的初期教會，應是每一個地方教會複印的對象。

從理論上來說，每一個地方教會都曾經複印初期教會的模式。然而，經歷兩千年的歷史沉澱，每一個地方教會都附帶了不少次層文化的沉積物，這些沉積物爲教會絕對不是必然。一個新興的地方教會複印另一個地方教會時，勢將不必要地也複印當中的沉積物，而令致初期教會的面貌模糊不清。

每一個地方教會都是獨特的，她帶有自己的特殊生活條件，也帶著自己的獨特困難和考驗。地方教會探索自己的道路，必須直接回到基督身上，以與基督一同生活的團體爲模範，複印這個與基督同在的團體，回到爲「愛」而自甘捨棄一切的基

督的懷中。

大陸教會在複印初期教會的時候，有別人所無的優越之處。教會面對一個並不諒解她的社會，成爲極度邊緣化的團體。初期教會以社會邊緣團體的身分出現，正好成了社會上一切邊緣群體的希望，在社會最底層結成一個生命之網。

香港教會應與大陸教會一同反省

目前中國大陸教會所十分嚮往的香港教會，其實本身也經歷了兩種複印，而陷於歷史上的迷路。香港教會實在沒有甚麼值得大陸教會嚮往。相反，面對九七後時代上的轉變，倒成了香港教會反躬自省的良機。

香港教會應該意識到其在歷史上的因緣際遇，出現了兩重複印，只是一種歷史上的偶然；台灣教會的處境大概亦然。這兩重複印既曾協助香港教會輕易地定位，但也令到香港教會背上絕不必要的歷史包袱。香港教會在這兩重複印之下，失了去體會梵二大公會議所說，「在旅途中的教會」¹⁰的經驗，失去了自己在路上「不斷跌倒，不斷再起」的經驗。

當前的香港教會面對政府的轉易、時代的變化，正好是本身擺脫歷史包袱的好時機。教會應捨棄其世俗的利益，從而撇除內心的恐懼，重新成爲一個受苦的團體，重新成爲社會上最卑微者的朋友。

論到香港教會能爲大陸教會作出貢獻的話，勢不在於其物質上的供給或人力的交流。香港教會應邀請大陸教會一同反省，靜靜地聆聽天主聖神在歷史中的聲音；在茫茫人海中走出未來的路向，爲億萬生靈帶出新的希望。

¹⁰ 梵二《教會憲章》第七章〈論旅途教會的末世特質、及其與天上教會的聯繫〉。